

“体用”境迁: 中国武术思维方式的哲学思想史考察

王少宁, 杨祥全

(天津体育学院 体育文化学院, 天津 301617)

【摘要】“体用”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思想史中表达能力最强的一对范畴,其理论架构深刻影响了后世武学。“与道同符”的体用性建构是拳术家阐释拳理的传统思维方式,这一理路很值得深入挖掘。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对武术思维方式——“体用”进行哲学思想史梳理与反思。研究发现:历代拳术家借“体用”这一传统思维方式推寻拳理,阐释武术的内在本质与作用现象,其间经过了由“宇宙生成论”至“功夫即本体”衔接演变的思想历程。研究认为:①“宇宙生成论”为武术体用思想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太极阴阳学说标志着武术体用思想的初步形成;②“功夫即本体”为武术体用思想成熟赋予了理学气质,本体功夫哲学隐含了拳术家对武学心性功夫修炼的推重。武术思想在“体用”境迁中实现了对自身的内在超越,每个阶段的体用思想演进及其内蕴的哲学思维,直接反映了历史的进程,体现着逻辑认知与历史演进的统一。

【关键词】体用;传统武术;宋明理学;武术语境;宇宙生成论;功夫即本体;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2)03-0091-11

DOI: 10.15877/j.cnki.nsic.20220505.001

“武术是文化更是思想”^[1]“任何思想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思想史的研究”^[2]“缺乏思想史背景的梳理,文本的校订和意义的阐释很可能是当代人基于其思维前见的曲解,哲学阐释也可能只是自说自话的海市蜃楼。”^[3]就更大的意义而言,“‘思想史’既不是单纯研究人们所在的外部历史境遇,也不是仅仅着眼于人们的思想本身,而是在兼顾历史境遇和主体自觉的同时,更多地着眼于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即‘思想’与‘历史’的互动。并且,这里的‘人们’,也不是泛指群体的大众意识,而往往是那些具备高度自觉和深度思考的思想家们。”^[4]因此,从人的思维活动和思维方式入手,研究人们(拳术家)于“创拳”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念和认识,即人们把什么看作武术的“体”,又将什么看成武术的“用”,将武术思想的研究范围和内容置于“体”“用”这一对哲学范畴、思维方式和分析框架内,见微而知著,可使“武术思想”这一具有很强包容性的问题不再漫无边际,不失为一条可行的研究路径。

“‘体用’是中国思想史中的概念,也是武术文化体系中的重要脊线。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思维方

式和分析框架,‘体用观’对建构武术理论有着重要意义。”^[5]从“体用”视角切入,对武术本体展开研究,不仅可以透视出拳术家“创拳”思想的大概样貌,藉此还能管中窥豹并寻觅其认知途径和武术思想的某种旨归。更为重要的是,武术体用思想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有着紧密联系,尤其在宋明理学等学术思想架构下,其体用思想的演进经过了由“宇宙生成论”至“功夫即本体”衔接演变的思想历程,每个阶段的体用思想演进,体现着逻辑认知与历史演进的统一,直接反映了历史的进程。就文献记载而言,借助宋明理学体用结构(太极为体,阴阳为用)的“释拳”之作,首推王宗岳《太极拳论》,以此为发轫,“体用”渗透到武术知识体系的方方面面,至清末民初,形成了“拳家体用说”。对于“以用为体,体在用中”的武术修习而言,“体用”对诠释与

收稿日期: 2022-02-11

基金项目: 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成果(2018SK140)。

作者简介: 王少宁(1982—),男,河北沧州人,博士生,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武术思想史。

通信作者: 杨祥全(1972—),男,山东聊城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体育历史与文化。

建构武术思想的意义不言而喻。既往研究对此鲜有关注。本研究旨在从“体用”这一“既旧且新”的视角切入,为武术思想研究提供更多的话语表达及可能性。

1 体用的哲学意涵以及武术语境中的体用含义

1.1 体用的哲学意涵

“体用”是一对中国思想中的原创性范畴。在不同语境中,其用义有别,且内涵丰富。“体用”在“中国思想”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意涵,可“理一分殊”为如下3种含义:其一,“体”指实体、形体、形质,“用”指作用、功能、属性,体用并举可概括为实体与作用的关系;其二,“体”指根本原理(原则),“用”指具体应用(运用),可概括为原理与应用的关系;其三,由具体的实体与作用的关系演变为本体与现象的关系,这里的“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表现),其中,括号意味着在逻辑上被包含。在第一种含义中,具有代表性的如唐代崔憬的“质体功用”说。崔憬在《周易探玄》中总结道:“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之妙用也。”崔氏的比类阐发为古典思维模式下的体用轴系,也是“器体道用”的转语,这种“以体用喻道器”的认识就哲学层面来讲还稍显模糊。南宋朱熹在“实体与作用”的关系层面上使用“体用”这一对范畴,如《朱子语类》卷六云:“如这身是体,目视、耳听、手足运动处便是用。如这手是体,指之运动提掇处便是用。”在这里,“体与用”指代的是具体事物的物质实体及其作用、功用。持此种观点的还有理学家邵雍,在邵雍那里,体与用

的关系即“体无定用,惟变是用。用无定体,惟化是体”,这种解释保留了“体用”二字的朴素含义。使“体用”上升到本体与现象的哲学高度,首推魏晋玄学。三国魏王弼《老子注·三十八章》:“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即是说,万物虽珍贵,但以“无”为宇宙本体,不能离开“无”以为用,开创了由讲一物之体用到论说整个宇宙之体用的先河。到了宋明的理学心学时代,二程(程颢与其弟程颐)以“理”为体,以“象”为用:“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6]在阳明的时代,“体用”已不是一般概念、范畴而成为人格修养或道德自我践履的终极目标,时人称之为“体用之学”,其晚年“身体力行”提出“良知”说,在“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总体逻辑下阐发良知本体功夫的特征、属性和作用。于此“即功夫即本体”,功夫所至即见本体,将心学本体论推向极致。

1.2 武术语境中的体用含义

“体用”在武术语境中有3种含义,散见于“武经”“武论”之中,与“体用”的哲学意涵之分相应,反映了人们以其实质含义在武术中的使用倾向(表1)。其中,吴殳《手臂录·枪法微言》中的“因敌成体”说以及《无隐录》中借“体用”解释器械(枪棍)形质与功用的关系,是目前所见清代最早的体用表述;从“理法”(原理与应用)层面形成的哲学思维,属于武术语境中体用的第二种含义,如“演练为体,对打为用”“盘架子为体,对习为用”“自习为体,临敌为用”等;吸收宋明理学“静体动用”的形上意蕴,上升到本体与现象的哲学高度,形成了“(太极)以定为体,以动为用”“(形意拳)养灵根不动心者为体,固

表1 武术语境中的体用含义
Tab.1 the meaning of Ti-Yong in the context of Wushu

书著名称	拳术家对“体用”的论述举隅	体用的哲学意涵
《无隐录》	长棍七尺五寸,短枪九尺七寸,其体相近,其用天渊。	实体与作用
《孙禄堂武学录》	以太极架子、进、退、顾、判、定言,谓之体;以棚、捋、挤、按、采、捌、肘、靠而言,谓之用。	原理与应用
《孙禄堂武学集注》	一气八卦为其体,六十四变,以及七十二暗足互为其用。体亦谓之体,用亦谓之体,体用一源,动静一道。	原理与应用
《太极拳论》	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	本体与现象
《孙禄堂武学录》	养灵根不动心者为体,固灵根动心者为用。	本体与现象
《太极拳谱笺》	十三势虽多言用,而定之一字,亦摄心法,乃太极之体。故十三势实赅括体用,称为总势者以此。	本体与现象
《苕氏武技书》	气以心为体,心以气为用。	本体与现象

灵根动心者为用”的体用结构。如徐震在《太极拳谱笺·十三势行工歌诀》中开篇即论:“十三势虽多言用,而定之一字,亦摄心法,乃太极之体。故十三势实赅括体用,称为总势者以此。”在这里,徐震将十三势中的“定”视为太极拳之“体”,以势“定”为“宗”,而将“棚、捋、挤、按、采、捌、肘、靠、进、退、顾、盼”诸法视为太极拳之“用”,这种思维方式为“静体动用”体用观的典型范例。“体用”是武术思想中特有的概念和范畴,其内涵被人们诠释并赋予意义的背后体现着逻辑认知与历史演进的统一。因此,从实体与作用、原理与应用上升到本体与现象的哲学高度,考察武术体用思想演进何以在主体自觉这一条逻辑主线上由“宇宙生成论”以致“功夫即本体”,是本文要着重论述的问题。

2 “宇宙生成论”为武术体用思想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2.1 太极与阴阳:武术体用思想的初步形成

以“太极”一词为界说的专名由来已久。在早期古文献如《易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周易正义》(“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汉书·律历志》(“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中都有论及,这里的“太极”被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即宇宙天地和阴阳两仪“淳和未分”的“元气”。其中,“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可释为:由作为宇宙万物之本源的太极分化出阴阳二气。对此孔颖达解释道:“太极谓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即是太初、太一也。”宋代刘牧在创造河图时说:“太极者,一气也。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而为一”。邵雍《皇极经世》体系,其基础也延续了“阴阳二气消长循环”之说。在中国思想史中,这个混成一体的“太极”,言下之意是“气”,而不是“理”,是故太极剖判,化生阴阳,为传统观念。二程在“万物之始皆气化”的基础上论证由“气化”而产生万事万物的命题,对宋明理学理论思维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南宋朱熹认为阴阳二气与万物化生皆是太极之“理”自身的显现或展开,其“太极论”(《太极图说解》)为《太极图说》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关于“太极与阴阳”这一对“体用”关系,朱熹主张有其体方有其用,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又说“盖太极是理,形而上者”^[7],可见,“理”在朱熹思想中是与“太极”等同的“本体”概

念,这里的理(太极),指的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本体。

在中国传统的思想世界中,太极是万物演化的始点,宇宙(天地)则是一个“太极生两仪”的生成过程。“太极”二字训为宇宙万物之本体始于周敦颐的《太极图》及《太极图说》。《太极图》内蕴的“太极学说”几为理学体用结构中宇宙深化论之正宗,为明末清初之后的王宗岳、武禹襄、陈王廷、陈长兴、陈鑫等援引《太极图说》以阐释拳理潜下契机。依《太极图》所示,“太极”一动一静正是在“元气”的推动下始生阴阳万物。实际上《太极图》及《太极图说》所表达的终极思想即在“无极而太极”的基础上追问生命生成背后的本原。就历史脉络而言,在两宋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里,人们习惯用“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依次相生的关系解释宇宙(天地)的演化,宋理学家普遍接受这种看法,即是说,周敦颐的同时代人把“元气”作为万物的始点是一个普遍价值选择。周子通过对“无极而太极”“太极动静而生阴阳”(图1)的思考,在《太极图说》中明言:阴阳五行万物皆出于太极,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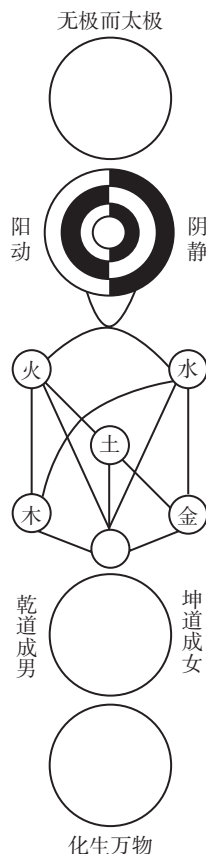


图1 周敦颐《太极图》

Fig.1 Zhou Dunyi's (1017—1073) Taiji (Supreme Ultimate) Diagram

极与阴阳五行万物构成的是“体与用”上的逻辑关系。又说,“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二气交感、化生万物”,表明阴阳、五行都是气。根据文意可理解为:“无极而太极”的本质、实体是气,阴阳、五行则是气之性质与功能的具体表现形式,人与天地万物都是气化生的结果。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太极学说”,内寓万物阴阳消长之理,为拳术家提供了广阔的想象和阐释空间,成为武术的哲学基础就不难理解了。

太极阴阳学说是以气一元论(“气”化生宇宙万物)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就武术思想史的发展而言,太极阴阳学说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庄子·说剑》与《越女论剑》已有剑法阴阳理论的阐述,其中的“夫为剑者,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已契合“道”之阴阳形态,剑法通过“布形候气,与神俱往”上升为“道”的层面即太极(形、气、神的妙合一体)。“‘开以阴阳’‘道有门户’为后世借用‘阴阳’概念和范畴阐释武术理论提供了源头活水”^[8]。明、清两代是武术体用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明人将“阴阳”一词运用到武术中,亦从器械层面指代动作技法的变化,如程宗猷《少林棍法阐宗》所言的“出手为阳,收手为阴”,俞大猷《剑经》提及的“阴阳要转”“更有阴阳诀,请君要熟记”等。清代以后,“阴阳”范畴被普遍运用到拳论、拳理和拳谚中,如“鹰熊竞志,取法为拳。阴阳暗合,形意之源。”(《形意拳》)“伸之为阳(鹰势),缩之为阴(熊势),均暗合阴阳也。”(《武当绝技》)“练形不外阴阳。阴阳不明,从何练起。”“阴来阳逆,阳来阴逆,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落点還元,即是此法。”(《苕氏武技书》)“人一身伫立之间,须要配合阴阳,方知阴来阳破,阳来阴破之妙。若不明阴阳,则无变化之妙,而有呆钝之嫌。”(《少林寺短打身法统宗拳谱》)就武术的运动状态和运动属性而言,正因为有阴与阳对立统一的运动,才会有动静、刚柔、虚实等相反相承、互为因果的变化,才会产生阴阳化生之功用,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就体认的观点而言,拳术家借“阴阳”阐发拳理的言说模式以及形成的认知架构基本沿承了前代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俯瞰武术发展的历史长河,清代王宗岳借用《太极图》的阴阳哲理解释拳理,将“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对立

统一的辩证思想寓于太极拳之中,可谓武术中的一个历史事件,为拳术家立派立言立德提供了理论资源。周敦颐《太极图说》“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演化模式,反映在王宗岳《太极拳论》中,即在“无极而太极而阴阳”的体用结构基础上,又派生出五行和八卦的太极拳技术架构,“标志着传统太极理论与古典哲学文化的最终契合”^[9]。《太极拳论》开篇所说的“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曲就伸。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唯一贯”即太极阴阳学说在武术哲理上的具体体现。

2.2 武术“宇宙生成论”思维方式的哲学内涵

周敦颐“太极学说”的诠释进路为武术体用思想的建构奠定了哲学基础。周子以“太极”熔铸一切,其贡献在于“在阴阳五行上面安置了一个本体世界,把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的功能与作用看作是太极本体的体现,表现了与阴阳五行家仅仅从‘结构’和天人感应的层面理解对象的不同致思倾向”^[10]。一方面,他对宇宙本体的理解是“无极而太极”,再一方面,太极元气由于其内在的阴阳动静的作用,派生出金木水火土五行,又由“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二”指阴阳,“五”为五行),即由阴阳五行之精妙而化生出万事万物和人,从中指出了“太极”生化的动因或机制。这种“天人同道而贯通为一”“主静立人极”的思想观念,蕴含着“太极为体,阴阳为用”“阴阳互为其根”体用观的初涌,不仅与先秦及秦汉以来的阴阳五行结构的宇宙生成图示有着某种渊源关系,也为太极拳有别于形意拳、八卦掌取“五行”“八卦”之理而以人为师,取“一气流注”之理,体认“天地运行”之理气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本体与现象上,太极为体,阴阳为用,阴阳二气的消长是太极的显用,这是宋明理学所说的“体用一源”。就周敦颐《太极图说》与王宗岳《太极拳论》的体用结构而言,太极与阴阳实为体用关系。太极为体,阴阳则是太极与天地万物相作用时的运动规律或称方法论。拳术家运用“太极为体、阴阳为用”的哲学思维方式阐释拳理,借阴阳、动静、刚柔、虚实、开合等哲学范畴作为知识与思想的载体并展现为描摹身体之感的解释学,这对武术的理论体系构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言:

“支撑古代中国人观念性框架的背景是关于宇宙时间与空间的想象与经验,以及由此推论出的太极、太一、两仪、阴阳、五行、八卦等概念符号体系”“这些符号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整套的观念,又由于类比和推想,渗透到一切的知识与思想之中。”^[1]受周敦颐《太极图说》宇宙论模式影响,依《太极拳论》文本所述,太极拳取人之身一气(太极)流行之“理”,以阴阳(攻防)、刚柔(劲力)、虚实(招法、重心)、屈伸(姿势)、进退(步法)喻其作用是确定的。“太极生两仪”的武术“宇宙生成论”是将整个宇宙“具身化”的一种思维方式,反映在拳势中,人立身中正平和,未动时混然为一太极之体,只要稍微一动就可分出阴阳、产生虚实。太极为体,阴阳为用,进而产生动静、刚柔、虚实、屈伸、进退等身体姿势的相反相承变化,这与宇宙的阴阳消长、转化规律是一致的。拳术家巧妙地将“太极”之“理”进行转换,借“身体之拳”来寻阴阳虚实之变,明了阴阳互根为懂劲,正所谓“阴不离阳,阳不离阴,阴阳相济,方为懂劲。懂劲后,愈练愈精,默识揣摩,渐至从心所欲。”《太极拳论》以太极立论,以阴阳生化之功用解释拳理,其“太极者,无极而生……”(无极而太极)“阴阳相济”(阴阳互根)“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无所偏倚之中)等原理实为宋明理学体用思想在太极拳术中的运用和体现,所谓“道寓于器,理在拳中”是也。

2.2.1 “身体微观宇宙”式的话语建构

在“身体微观宇宙”式的话语建构中,理学家所理解的《太极图》与道家理解的《太极图》意义有所不同。首先,道家和理学家在“天人在本体上是一”的理解上本无二致,并且也都认为天地大宇宙,人身小宇宙,“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万川,则随处可见”,但是在修炼的终极意义上不在此图所揭示的宇宙论和世间万物创生过程,而在于这个创生过程要追溯到存在于宇宙创生之前的“无极”,因而这个“太极图”是自下而上读的,这跟理学家依图由上而往下读正好相反。其次,图的象征意义不同,理学家理解的“五行”是气之性质与功能的具体表现形式,道家则将“五行”对应人体的“五脏”,并且组成图的3个部分(顶端的大圆圈,底端的大圆圈,以及上下两组大圆圈之间的金、木、水、火、土等5个小圆圈和一个小圆圈形成互通的组合物)所表示的不是由“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所开

出的“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而是人身体内的3个“丹田”,分别对应人之体的腹部、胸部和头部。道家有“元精”“元气”“元神”修炼之说,而“内家拳”的内功修炼(练气)基本采用了道家修炼内丹术的方法,形意拳“炼精化气、练气化神、炼神还虚”之气化过程就是一例。受此影响,“内家拳”在吸收借鉴基础上形成了练形质以使元气充盈、练元气以调神气妙用、练元神以还虚灵之道的内功修炼图示。在“身体微观宇宙”的思想指导下,武术的内功修炼(练气)活动,被认为是与宇宙“同构”并建立联系的重要一维。如曰“人之一身,浑身上下都是太极,即浑身上下都是拳。不得以一拳目拳也。”(《陈氏太极拳图说·太极拳推原解》)可见,这种“身体微观宇宙”式的话语建构就技术层面而言也来自道家。最后,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与道家讲求内丹修炼要追溯宇宙的创生过程而回到万物生化的原点——“无极”不同,理学家的构想则认为人是宇宙性的存在,在本体上与宇宙为一,因此人要修炼(自我实践)就必须在主体存在上主动参与并建构由“无极而太极”的运行所开出的宇宙自然演化过程。周敦颐的《太极图》和解释《太极图》的《太极图说》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这个图不仅揭示了一个形上宇宙架构,在阴阳五行上安置了一个本体世界——“太极”,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形上宇宙架构是一个建立在道德意义上的形上宇宙架构,是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理论构想。所谓世界、宇宙的本体,宇宙本体即是宇宙的终极根据以及人生价值的源头可以从《太极图》《太极图说》中可见一斑。

就横向而言,传统哲学宇宙论思维方式与西方宇宙论不同,其直接指向的是天与人、体与用的关系,二者不是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我们知道,传统哲学的最高理想是“天人合一”,周敦颐《太极图说》论证的落脚点也在于此。所谓“天人合一”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主体)与宇宙本体(天地)的关系,一个是人(主体)与道德本体(本心)的关系。在拳术家看来,人作为身体技艺与情感意志的主体,可以通过描摹身体、雕琢技艺与大本大源的天道(太极)相互感通,实现“合体用,一天人”的武学修为境界。就纵向而言,“身体微观宇宙”式的话语建构源自《易经》(又称《周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说,即是从身体经验类推世界、宇宙经验的思维方式为

武术理论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这种思维方式是在传统哲学理论资源浸润下形成的,在不断推动主体提高认知途径、提升道德修养的同时,也使得习武者“主动周察天地万物之理,积极感会天地万物之性,尽力融摄天地万物之神,接近、趋向甚至与宇宙本体相合一”^[12]。他们通过修习,得以切实体察阴阳相济之道、形神妙合之理,其中所收获的身体感觉和情感知觉,不仅是因躬身力行、持之以恒而“以此感知世间事物的变化,体认天地万物之理,融摄天地万物之性,以回归自我本性,浑然与天地一物”^[13],更是习武者“体察天地之变,洞观万化之源,而心不为其劳役,在高度思辨的过程中获得的理性体验”^[14]。正因如此,武术技术创造强调象形取意和道法自然,在“道进乎技”(语出:《庄子·养生主》)“技进乎道”(语出:《八卦拳学·序》)的双重循环修行中,追求人之身体内外与宇宙自然地贯通一体,即所谓“物我一体,内外无隔”的应然之境,这种基于对宇宙自然认识而生成的“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整体观为武术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认识论基础,在这一认识论的指导下,习武者只有通过长期体认,用身体感悟拳理,体悟而其用不遗,才能使功夫上身(“功夫”所至的功力与素养),达于身体之“道”而近乎天地之“理”,此“道”此“理”既是武术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主体实现内在性超越的终极指向。

2.2.2 “由道而理而内劲”的话语转换

“由道而理而内劲”是武术思想史发展的必然。在道家的视域中,“道”是一个最基本的范畴,它既是宇宙生成的根本,也是宇宙变化发展的客观必然法则,它存在于大小之境,网罗有无两界。如周敦颐《太极图说》开篇所说的“无极而太极”,其中的“无极”就是援引自道家,老子云“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也就是说,古人对宇宙世界的理解,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这在思想发展中是经常出现的现象。老子认为太极的精神是“道”,由无所不贯的“道”演化出天地万物;同时,“道”又是本体意义上的天地万物之本体。即所谓“道生万物,万物归于道”。传统武术把老子的“道”吸收进自己的体系里,它的表现是通过习武者“行拳走势”而获得一种生命本真的体悟和人生价值的追求,以及对天道自然、宇宙间事物“生化之理”的体认。武术的修炼过程,本身就是生命主体的“求道”(体证)过程。因

此,“一阴一阳之谓道”思维方式所开展的武术之理,终极处在于保养身体、养护生命进而达到“详推用意终何在,益寿延年不老春”“法于阴阳,合于术数”的修习境界,与老子“道法自然”“复归无极”之旨一脉相通。此外,道家有“修道逆行”或练“返还”之说,就体用结构而言,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让后天之“练”返回至先天“主敬”状态,也即回归“本体”“本质”“本真”。“敬”是通贯“动静”、贯穿“内外”的功夫,传统武术训练遵循了该理路,如形意拳“明劲”“暗劲”“化劲”,太极拳“着熟”“懂劲”“神明”,大成拳“以言其体,则无为不具;以言其用,则有感即应”等表述,是将为武、用武之道在主体(身体)之中展开的,其生命力在于对劲力本体的表达和对主体(身体)的塑造,“习武”是“先天自然之能”亦即劲力不断找回的过程,复归于“自然劲”“先天力”的过程,亦即回归“先天”(身体),拳理所揭示的“静为体,动为用”,拳势中的“以练周身一体的内气与劲力为体,以练攻防一体的技击战术与技巧为用”经由主体(身体)体认、体悟、体证的功夫路径而得以著显、澄明,“功夫技艺上身”进而“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的“触而即发,感而遂通”境界,正是对刘宗周“工夫愈精密则本体愈昭莹”“识得本体,则工夫在其中”^[15]的最好诠释。

张震^[16]认为,“传统武术的‘以气充体’和‘周流不滞’本质上都是为了表达武术技击体认的本体:劲力。然而,‘劲’本身是无实体的,难以言传,因而古代武术家借‘气’而‘象’之。由此,身体的节节贯串,往往被表述为:‘完整一气’‘一气呵成’‘上下一气’‘动静一气’‘三气合一’‘周身一气’等,这种大量由气‘象’劲的方法,所类通的正是自然界流动不居、不可割裂的完整‘气动’”。可见,武术内气与劲力互为依托,相即不离,拳谱中的“周身一体”“周身一家”“周身一气”始终未脱离“以气象劲”的言说模式。气是“天地大宇宙”化生万物的本源,也是“人身小宇宙”运动的原始动力。传统哲学对“气”的研究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庄子秉承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合”的微言大义,指明阴阳二气是形成万物的物质基础。宋明时期。“气”学说上升为本体论的高度,理学家张载以“太虚”论本体,是对传统哲学“气本论”思想的延续,他认为:“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

尔”“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17],在张载那里,“太虚”是“气”散无形后的“本体”状态,“太虚”相对于“气”不是并列或时间先后的关系,而是体与用的关系,即太虚以气为用,气以太虚为本体。孙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也沿用这种言说模式,他指出:“夫道者,阴阳之根,万物之体也。其道未发,悬于太虚之内;其道已发,流行于万物之中。夫道,一而已矣,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拳术曰内劲,所以内家拳术有形意、八卦、太极三派形式不同,其极还虚之道则一也。”^[18]“太虚”概念和范畴被武学宗师孙禄堂援引并以此阐释太极、形意及八卦拳理,已发/未发、太虚/气的理学言说模式、价值取向就是一例。而最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方式妙合了理学与武学相互贯通之“理”,“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拳术曰内劲”道出了明清以降“内家拳”理论建构和技术体用(此处的“体”可作体认、体悟和体证理解)的本质所在。

3 “功夫即本体”为武术体用思想成熟赋予了理学气质

3.1 本体与功夫:武术体用思想成熟的文化符号

就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体用范畴被运用到认识论、伦理学和方法论领域时,尤其在阳明心学出现之时,“体”已不再是“太极”,作为“体”之属性的“用”已不是“阴阳二气”,这里的“体”就演变成了认识主体和道德本体,与道家、佛家的“意会”不同,宋明理学更强调“体认”“体悟”“体证”的功夫进路,立基于“体”之主体动用的含义,“用”就成为改善认识主体或实现道德本体(本心、心之本体)所采取的修养手段和方法,即所谓“功夫”了。在武术中,“功夫”既指代“格拳”投入的时间与精力,又突出“功夫”所至的功力与素养。就文化语境的层面而言,魏晋玄学至宋明理学所完成的宇宙论向本体论转向影响到了拳术家的思维方式。如果说“宇宙生成论”丰富发展了武术的认识论体系(关于人自身及人自身与宇宙万物关系的认识),为武术体用思想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本体功夫哲学则隐含了拳术家对武学心性功夫修炼的推重,体认武学之“道”并进而向内觅“理”,这种思维方式根植于武术文化结构的最深层,在日用之中支配与制约着人

们的修炼、践行以及行为方式。“功夫即本体”是理学体用思想在武术中的具体运用,由“身体宇宙”至“功夫本体”衔接演变的思维模式在主体自觉这一条逻辑主线上赋予了武术“体用”新的哲学内涵。

学问的开端离不开思想史的梳理,武术亦然。通过梳理武术史的相关知识可知,拳术家对于武术本体的研究,宋明以前还基本停留在形而下的肢体文化与技法层面,明清时期重点不在于此而转向对内气与劲力的探讨。这种由形而下的肢体文化与技法向形而上的内气与劲力的研究转向,既是武术与军事分野趋向个性化发展之后,“由制人到制己”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是主体对武术“体用”内涵进行分析、选择后的必然结果。习者心性主体“由器械而拳术”的主观意愿之显现就是一例。晚明至清代转型后的拳术修炼观也更多是沿此“即本体即功夫”路径“体用一源”进而“显微无间”的。此外,“内家拳法”大都主敬、主静,依然没有脱离宋明理学尤其程朱理学的范畴,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范畴在传统武术中的运用就是一例。理气,本体论上,是理气不二(言理则气在其中),功夫论上,则气是理,心渗入身、即身是心。就中观层面而言,武术动作中的“理”与“气”是不分的。这种“体用观”为武术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论依据。就求气理的途径而言,八卦掌有“理气为体,身体手足变化为用”^[19],太极拳从主体(人)身体动作开合动静相交处的一气之流行中求理(劲),在太极拳知识体系中,“气以直养而无害,劲以曲蓄而有余”“太极即一气,一气即太极”,实际上道出了太极拳术的本质,即以“理气”为基础,以致一气流行之“中和”为功夫进境。综上所述,传统武术对于“理”“气”概念的理解,对于本体与功夫关系的态度,与宋明理学尤其程朱理学在整体上是一致的。

在中国思想史这条大河之中,宋明理学可算作湍急壮丽之一处。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进路有所不同,宇宙论与天地万物创生的问题不在阳明入手处,其入手考虑的是人的世界,即把天理直接拉向人心,良知即天理,心即是理,心外无理,此心此理,人固有之。这里的“心”并不是指知觉而言,而是指“心体”或“心之本体”。因此,王阳明说:“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是谓体用一源。”^[20]换言之,体是用之体,用是体之用,本体与现象处于相即不离的辩

证状态。为静时可见心的本体,动时可见心的作用。因此,体和用不但不能相互分离,而且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一体的。其心学“体用观”的本质以人的体验认知、内心活动为前提,以“知”(内在的精神状态)为基础构筑起来的体用关系对武术理论的影响有莫大的关系。明清之际,阳明提出“致良知”,以“良知”(先天的、本然的或未受人欲干扰的道德理性)作为心之本体来说明道家的精、气、神,为各阶层尤其下层民众所接触和接纳,此一时期,正是武术“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因此,拳术家对“心”(良知)的阐发自然会受到阳明身心之学的影响。如清代吴殳《手臂录》专列“治心篇”,有“用技易,治心难。手足运用,莫不由心”的体用阐发。《太极阴阳颠倒解》解释道:“夫如人之身心,致知格物于天地之知能,则可言人之良知、良能。”这与阳明提出的“良知者,心之本体”“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在哲学体用内涵上是相通的。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之后的拳种训练大多受到了阳明心学之心性功夫修炼的影响,如“脱枪为拳”的心意六合拳、“拳禅合一”的少林功夫等。

由此可见,武术各拳种训练在方式方法上虽有差异,但其共同本源和理论基础都是围绕“理气”“动静”“心性”等体用结构进行言说与体证的。在这里,体用范畴就等同于本体功夫范畴,“体用合一”便与“本体功夫合一”打通。所谓“即道体即体道”,“拳术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超然境界经由主体(身体)体认、体悟、体证的“抵入”径路而体现“技道并建”^[21]的方法论品格了。

3.2 武术“功夫即本体”思维方式的哲学内涵

3.2.1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本体功夫论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一种源于对兵法之常的体认而又不拘泥于战阵形式的辩证思想(《宋史·岳飞传》),武术理论受兵家思想的启发,更多地“表现为对其战术思想的直接移植,或者直接运用兵家理论来论证自己的武术思想”^[22],形成了“形神俱妙”“体用兼备”的“具身化”思维。实质上,在武术理论中引用兵家论述,吸收借鉴本身即是对古代军事哲学的一种兼容或转化,以为武术之“用”。不可否认,具有“两两相当”搏杀属性的武术技击,自然不完全等同于古代的军事作战,但二者形式上的差距,并不会影响二者在认识理念上形成某种默契。

就传统武术的训练思维而言,习武者注重心之本体与形、神之妙用的心性功夫修炼本身是对“功夫即本体”的诠释。如少林功夫就将“练心”与佛门的练就“不动心”融为一体,即所谓“禅观练胆法”^[23]。《少林拳术秘诀》中记载:“究其极致所归,终以参贯禅机超脱于生死恐怖之域,而后大敌当前,枪戟在后,心不为之动摇,气始可以壮往。”“欲学技击先学不动心。”^[24]在拳术家看来,禅是超脱生死,消灭恐怖心的一种方法,参禅旨在练就“不动心”,只有静心、胆大,将生死置之度外,武技才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武术吸收佛家“禅定”修习方式,侧重于对“心”的修炼,其修持的终极境界,即是超越武术。正如陈鑫在《陈氏太极拳图说》中所说:“自初势至末势所图者,皆有形之拳,惟自有形,造至于无形,而心机入妙,终归于无心”,这种表述与《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境界是相通的,都说明了心、手关系。少林功夫也好,太极拳术也罢,功夫体认皆有一个“复”的理路,即从“有心”“有形”的思维推向“无心”“无形”的“神明”境界(前人亦用“神化”“脱化”等指称)。在传统训练中,一招一式的形架练习只是个走向脱化神明的起步阶段,“练体”至心手相凑,周身一体,“练用”至随心所欲,不落形迹,功夫已臻化境时方为“神明”。这里的“神明”,可理解为功夫得以校验或达到的一种应然境界。

“练拳不知体中用,枉费功夫终无成”。就“体”而言,武术“动静”(已发/未发)“感应”(即感/即应)亦摄心法。周敦颐曰:“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武术讲“动中含静,静中含动”,虽是说法不同,道理却是相近的。“动中含静”指手、眼、身、步的外动和心神意气的内静,动静处蕴含进止之机;所谓“静中含动”,并非身体的不动或思维的枯寂,而是身心被调动的最活跃的时刻,如形意拳三体式“三尖相对”之“静”就蕴涵着意念引导全身上下、左右、前后协同攻防之妙。动亦定,静亦定也。“静”(定)乃武术心性功夫修炼之“本”,为静时可见心之本体,动时可见心之作用。戚继光在《止止堂集》中云:“感应即是本体”,戚氏称“势势相承”之拳为“遇敌制胜,变化无穷,微妙莫测,窈焉冥焉,人不得而窥者,谓之神”。裴乃周解释道:“神者,心之灵明,触而即发,感而遂通也。”^[25]就“用”而言,“形”

是“用”的原则、基础,“神”是“用”的实质要求,形、神妙合为用,经长期体认实践,才能在环境应对中“劲贯招而行”“招随劲而变”,与人交手才能产生“触而即发”“有感即应”的技击意识。功夫技艺练至“形神俱妙”处即是“心之灵明”正当处。吴殳在枪法的体用诠释与阐发中云:“手足运用,莫不由心”“我无所能,因敌成体。”^[26]如果说“由着熟而渐悟懂劲”是“得之于己”功夫上身的必然结果,“懂”是“心之灵明”的本能活动,那么“由懂劲而阶及神明”则是“施之于彼”功夫进道的无上标举,“明”包含着心性主体对基于双方时空、距离变化所形成的各种“机”(几)“势”(力)的洞彻和把握,“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荀子》),这也正是持续牵引武者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强大动力。因此,功夫(由着熟而懂劲而神明)至最高次第为“神”,善用功夫处,即是本体正当处,心(定、静)为本体,心之本体的发用流行、体认实践(形、神之妙用,拳、法之精微)即为功夫,于此心(知)身(行)合一,体用一如,功夫所至,即为本体。清代武术家杨炳在《习武序》中注明:“至圣之心如明镜止水,无彻不照,事来随应,不先事而为之备,不后事而为之留,切契内外之道,深合时措之宜。”陈长兴在《用武要言》中指出:“胆欲大而心欲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27]可见,拳术家们围绕技击所体证出的“触而即发”“有感即应”思维方式与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所说的“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在本体功夫进路上是一致的,意即所谓“灵明”之本体,也就落在“具身”的功夫走向之中。

3.2.2 “中和为体,致中和为用”的致道体用论

就修养处而言,理学家心性主体的精神修炼和道德实践是一种工夫与习武者心性主体的修炼和武德实践是一种功夫在哲学含义上是相互贯通的。传统哲学的“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日用常行即是道”是将作为道德、伦理、心性等道体之诠释赋予体认、体悟和体证的工夫。就此而言,习武者改善心性主体(或者说心之本体)的修炼与武德实践也是一种“功夫”。在这里,工夫通功夫,变化气质是功夫,“中”是立人之本,变化气质之体,“和”是行为之方,刚柔曲直之用,正所谓“诚于中者必形之于外”,故《中庸》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境界之说。以王宗岳《太极

拳论》“不偏不倚、忽隐忽现”与“无过不及、随曲就伸”为例,“不偏不倚”“忽隐忽现”的“中”是作为心体的“中”,是“本体义”,是对心之未发的“体”而言。陈鑫对此“中”有着更为明晰的理解:“不偏不倚,非形迹之谓,乃神自然得中之谓也。”“无过不及”“随曲就伸”的“中”是作为行为实践的“中”,是“发用义”,是对心之所发的“用”而言。其意指明:过与不及皆为“失中”,掌握阴阳虚实之机,当在他力将发而未发之际,体认“时中发用”“乃见中因”之道(体道),使整个运动体上处于“太极”的灵性通达状态。此“四句教”即习武者所讲的“既可练,亦可发”的“体用”一体。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孙禄堂在《拳意述真》中还说:“此时方知形意拳是个中和之道理,所以能变化人之气质而入于道也。”^[28]其意是说:心性与拳术,心体与功夫本是体用同源、显微无间的关系。在这里,即功夫即本体,即心即理,理不在拳外,心外无拳理,功夫以本体为提撕,本体以功夫为著力,形意拳格“五行”“十二形”也好,“致中和”也罢,各形各理实为一“理”。

孙禄堂提出的“中和为体,致中和为用”与《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王阳明“良知为体,致良知为用”在内在结构上是一致的。在阳明这里,中正内心属于未发,修养自身属于已发。心正也就是中,身修也就是和。孙禄堂认为:“在内为意,在外为形。意之所至即气之所至,养气功深得中和之正轨,而形于外者,自然从容中道,形上形下一以贯之。”^[28]“致中和”是为武、用武之道的至高境界。杨谱中也说:“诚者,天道;诚之者,人之道也。”直取《中庸》篇中的观点论述拳术之全体大用。由此可见,中国武术以“中和为体,致中和为用”为进道功夫,以追求理想人格为体认阶序,以“理”之体描摹身体,以“法”之用雕琢技艺,追求理明法精的应然之境,在身体处于虚实、进退、屈伸中“格拳”“致道”,这个道即武术之道——劲的习得。在《太极拳谱》中,陈长兴首次提出武术(主要指的是拳架套路)运动“无往非劲”的观点。这既是各拳种在长期训练实践中形成的“共识性”思维,也是习武者以技服人、以德服人进而变化气质的“中和”之道。“习武”是明心见性、性命双修的体认过程,与西方体育追求“野蛮的文明”或“人的自

然化”旨趣不同,中国武术是以“体道,味道进而以武入道”为思维进路,在道体之诠释中注重“自然的人化”(道德本体或伦理主体)的内在性超越,在这里,主体武德与功夫践履弥合一体,立人之本(内在本性)与行为之方(外在规范)相统一,所谓“外现功夫,内蕴武德”^[29],“拳以德立”的价值规定之于习武者的整体气质,是在礼之体“德”的规定下知(智)勇精神的体现,强调“涵养道德”的“中和”境界,习武者主体变化气质时恰是性体流露处,避免武德失范和不加节制的粗俗野蛮。

4 结语

“思想二字从心,心之官则思”。就武术“宇宙生成论”至“功夫即本体”的“体用”境迁这条线索(视角、路径)而言,历代拳术家对武术体用的探究展现了其对武术本质的持续关注和体认,但是,不管哲学认识和使用倾向如何变化,只要从本体与现象的哲学角度去认识和理解武术体用范畴,其基本含义则相互贯通,没有明显的分歧。就哲学思维而言,武术之“体”有本体、本质、实体等含义,“体”蕴意根源、根据与不变;武术之“用”有表现、作用、功用等含义。作为分析框架而言,武术之“体”(如“仁以释礼”的人文精神、“德艺双馨”的价值规定、“以气象劲”的思维模式等)是其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武术形式内在精微的基础,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恒常不变的;武术之“用”则是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即不同形式在时代中的运用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如健身之用、防身之用、教育之用、艺术之用、修身之用等,但归根结底其本质特征还是技击之用。由此可见,“体用”既是一对哲学范畴、思维方式,又可作为一种研究框架和分析工具,在“体”与“用”中思考武术发展的实然与应然之境,其诠释进路本身内聚了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双重特性,为武术思想研究提供了更为包容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范式。哲学研究的范式,顾名思义,即从某个视角去解读某个思想,这样研究的意义在于某个思想可以影响、作用、帮助并指导某个视角的问题。正如有人评价,“冯友兰曾把研究传统哲学的方法分为哲学的方法与哲学史的方法,前者着重于对文本原意的把握;后者则着重于对原典思想深层结构的把握,它不是一件陈述性的工作,而是一件创造性工作”。克利福德·格

尔茨指出:“文化研究不是实证科学和实验科学,而是一门探讨意义的解释科学。”^[30]就这个意义而言,“创造性的解释”具有两个面向,一方面是对武术本体进行传统意义上的诠释,另一方面是在诠释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理论或话语体系的建构。因此诠释与建构武术体用思想,思考武术如何在当代维持自身的文化身份,保持文化色彩上的民族特性,对“武术研究”这一命题来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银行,刘轶,杜舒书,等.明清思想与中国武术发展及启示研究:基于“向实”的线索[J].体育科学,2019,39(11):26-39.
- [2] 刘祖辉.中国近现代武术思想演变的阶段特征研究——价值取向的视角[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 [3] 张震,李秀红.返本与开新:中国武术原典诠释基本问题论绎[J].体育学研究,2019(2):48-57.
- [4] 彭国翔.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0.
- [5] 王少宁,杨祥全.体用思想在武术中的运用及启示[J].体育学研究,2021,35(4):76-82.
- [6] 程颢,程颐.二程集[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
- [7] 朱熹.朱子语类(一)[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
- [8] 杨祥全.中国武术思想史[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
- [9] 周伟良.传统武术理论与中国古典哲学文化的契合[J].体育与科学,1990(4):19-21.
- [10] 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 [11]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
- [12] 李守培,郭玉成.中国传统武术天人伦理的历史形成研究[J].体育科学,2016,36(12):77-84.
- [13] 阳家鹏.基于“气”的传统武术内劲研究[J].文化遗产,2021(1):94-101.
- [14] 金玉柱.中国武术:一种身体的文化修行——基于身体哲学的视角[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7,40(4):127-132.
- [15] 刘宗周.刘宗周全集(六)[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 [16] 张震.传统武术“易筋”的身体训练哲学[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8,52(10):60-65.
- [17] 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8] 孙禄堂.孙禄堂武学集注[M].孙婉容,校注.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
- [19] 李志明.孙禄堂拳学的身心教育观[M].台北:阿含文化有限公司,2003.
- [20] 王守仁.阳明传习录[M].杨国荣,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

- 版社,2020.
- [21] 张震.传统武术“技道并建”的功夫哲学诠释[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0,43(2): 60-70.
- [22] 乔凤杰.正出而濡用——“武术与兵家”研究之一[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6,26(3): 79-81.
- [23] 旷文楠,胡小明,郝勤,等.中国武术文化概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 [24] 尊我斋主人.少林拳术秘诀[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 [25] 苕乃周.苕拳拳全集(上)[M].陈万里,等,整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
- [26] 吴旻.手臂录[M].马力,汇编.中国古典武学秘籍录(上卷).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 [27] 王宗岳,等.太极拳谱[M].沈寿,考释.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
- [28] 孙禄堂.孙禄堂武学录[M].孙剑云,编.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
- [29] 戴国斌.武术人类学研究:概念、议题与展望[J].体育学研究,2021,35(3): 1-10.
- [30]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作者贡献声明:**
- 王少宁:提出选题,设计框架,调研文献,撰写修改;杨祥全:指导修改,审核论文。

Evolution of “Ti-Yo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on the Thinking Mode of Chinese Wushu

WANG Shaoning, YANG Xiangquan

(Sports Culture College, Tianjin University of Sport, Tianjin 301617, China)

Abstract: “Ti-Yong” is the most expressive category in the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The thought of “consistent with principle” is an important way of thinking for boxers to explain Wushu theory, which is worthy of in-depth exploration. Comprehensively using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combs and refl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Ti-Yong”, a unique mode of thinking in Wushu. It is found that the boxers of all dynasties use “Ti-Yong” to explain Wushu theory as well as explain the internal essence and function of Wushu, which presents an ideological course from “cosmogenesis” to “Kung fu as noumen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① the theory of “cosmogenesis” lay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Wushu Ti-Yong thought, and the Yin-Yang theory of Taiji symbolizes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i-Yong thought in Wushu. ② “Kung fu as noumenon” fits the Neo-Confucianism characteristics as Ti-Yong thought in Wushu becomes sound, and it implies the emphasis that boxers put on the nature of the mind and Kung fu training. The theory of Wushu has realized its own internal transcendence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Ti-Yong thought, of which every stage and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within it directly reflect the process of history and the unity of logical perception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Key words: Ti-Yong; traditional Wushu; the Confucianism of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Wushu context; cosmogenesis; Kung fu as noumenon; philosophical thought